

# 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與評價

黃 自 進

## 摘 要

吉野作造(1878-1933)是戰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以研究中國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及明治政治史而著名，也以鼓吹民主政治、提倡全民選舉而被時人譽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

吉野對孫中山的評價之所以前後不一，從否定轉變成肯定的關鍵在於他對中國革命認知的角度以及他個人政治理念的演變。早期，他否定孫中山，因為他將中國革命定位在種族革命，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在企求民族的復興。由於他對中國革命的期許只限定於民族的復興，因此他不齒於孫中山為追求民主大業，不惜借重外援，犧牲民族利益的做法。

爾後，「五四運動」爆發，吉野在欣見中國學子積極追求政治民主之餘，對孫中山在中國民衆政治觀念啓蒙活動上的貢獻開始注目，對孫中山的評價遂逐漸改變，由否定轉為肯定。他肯定孫中山則是因為他已能從一位單純的民族主義者的角度轉變成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角度來探討問題。換言之，他對孫中山的推崇，始於他體會到三民主義的前瞻性，始於他開始理解國家、民族的利益是建立在每個人基本生存權受到尊重，民主政治的最終價值莫過於維護個人的基本生存權，也始於他認清孫中山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和國民的福祉」，與他在日本奮鬥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 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與評價

黃自進

- 一、前言
- 二、否定孫中山的革命
- 三、對孫中山評價的轉變
- 四、全面肯定孫中山
- 五、結論

## 一、前 言

吉野作造（1878-1933）。<sup>①</sup>是戰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以研究中國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及明治政治史而著名，也以鼓吹民主政治、提倡全民選舉而被時人譽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大正時期（1912-1926）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

---

① 吉野作造生於1878年，是日本宮城縣古川市人。1904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奠定了他往後在日本學術界發展的基礎。同年進入母校研究所，繼續深造。1906年在母校師長梅謙次郎的介紹下，到中國擔任袁克定的家庭教師，這是他與中國發生淵源的開始。1909年應母校東京帝大之聘回國任職。1910年奉派到歐洲留學。1913年學成歸國，仍回母校擔任教職。1914年因同僚寺尾享懇請，參與專門培養中國革命黨幹部「政法學校」的教學工作，這使他有許多機會與革命志士來往，其中也包括孫中山。1916年年初，他著手撰寫中國革命史，介紹革命黨的理想。吉野以其本身的學術基礎，再加上與中國南北政要都會有接觸，因而他的中國研究，頗有獨到之處。同年1月，他發表「試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展開他在日本鼓吹民主運動的生涯。往後的歲月，他不斷為文批評日本的專制政治，介紹民主理論，提倡廢除選舉資格。此時，時逢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世人鑑於他對推展日本民主運動化的貢獻，稱譽他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1924年1月，辭東京帝大教職，入朝日新聞社擔任主筆，旋即因言行觸犯日本政府當局，而被迫去職。於同年7月，仍回母校東京帝大任教。1926年，參與「社會民衆黨」的組黨工作，期待新政黨的成立，能促進日本政治的民主化。但不料一手所培養的政黨，竟為擴張黨勢犧牲建黨理念，而採用與右翼軍人合作的政策。為此，吉野與社會民衆黨劃清界線。1932年，發表「民族與階級與戰爭」一文，除了力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不當外，也抨擊社會民衆黨坐視政府侵華政策的不義。翌年，逝世於神奈川縣。

政治社會全面爭取民主平等的萌芽時期，它的主要精神是向舊秩序挑戰，並謀求社會多元化。吉野在這個時期開風氣之先，以啓蒙者身分活躍於輿論界。尤其是大正中期以後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勞工運動，以及大正末期相繼而起的新興政黨，例如社會民衆黨等，都與他淵源深厚。<sup>②</sup> 因此他的言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吉野早期對孫中山一直持否定態度。民國八年（1919）五月，「五四運動」爆發，吉野在欣見中國青年學子積極追求政治民主之餘，對孫中山在中國民衆政治觀念啓蒙活動上的貢獻開始注目，對孫中山的評價遂逐漸改變，由否定轉爲肯定。戰後以來，研究吉野與孫中山的論文，並不罕見。但基本的研究方向，却僅止於陳述各時期吉野對孫中山的看法，<sup>③</sup> 專門分析他對孫中山評價的形成與轉變的著作則仍屬欠缺。本文有鑑於此，遂將研究焦點專置於探討早期吉野爲何對孫中山持否定態度，爾後又爲何改持肯定態度；並循吉野對中國革命認識之由淺入深以及他個人政治理念的演變等線索，分析他對孫中山評價的形成與轉變之間的互動關係。至於吉野個人對孫中山評價的前後不一，對近代中日關係所造成的深遠意義及影響，當另撰專文探討。

## 二、否定孫中山的革命

吉野早期對中國革命一直持否定態度，民國四、五年（1915-1916）護國軍起義討袁，吉野著手研究中國革命史，對革命的態度遂逐漸改變，由反對轉爲肯定。<sup>④</sup> 但吉野肯定中國革命時，並沒有肯定孫中山。箇中原因則必需從他的中國革命觀加以探討。

吉野無意否定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元勳地位，可是他並不認爲孫中山所代表的思想是中國革命的主流。他認爲奠基中國革命的基礎是同盟會，興中會只是革命運動萌芽時期的一個啓蒙性的革命組織。因此他主張探討中國革命史，應以同盟會爲焦點。同盟會的成員，是以留日學生爲主的。絕大部分的成員，在留日之前，對革命並沒有深刻認同。他們之所以立志革命，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爲受到日本的影響。換句話說，他們是因爲留學日本，受到現代文明的洗禮，目睹先進國家進

②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とその後（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頁24-42，155-156。

③ 野原四郎，「民本主義者の孫文像」，論集日本歴史刊行會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有精堂出版株式會社），頁234-242。

④ 詳情請參閱拙文，「吉野作造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民國80年6月），頁237-247。

步，痛感祖國改革必要之際，轉而投身革命的。他們之所以立志革命，和孫中山毫無關係。而他們之所以加入同盟會，也不是因為受到孫中山的感召。孫中山在同盟會，僅止是扮演名譽領袖的角色。

對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之事，吉野有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孫中山能脫穎而出，並不是根據他的實力，完全是得利於時勢。據吉野的分析，武昌起義是由中部同盟會籌劃，孫中山事前毫不知情，事後也沒有參與。孫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得利於革命黨內部的鬭爭。當時革命陣營中握實權的黃興及黎元洪兩派，由於互爭大元帥一職相互僵持不下，遂轉而推舉形象中立的孫中山出任領袖。孫之所以被考慮，一是他在國內沒有權力基礎，二是他的革命長老形象。在吉野眼中，孫中山在辛亥時期，所扮演的只是一個過渡性的角色。

至於護國軍之役，吉野也否定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吉野認為護國軍起義與孫中山毫無關係。他認為護國軍之役是舊國民黨人利用梁啟超、蔡鍔等立憲派的地盤，苦心耕耘的成果。而這些舊國民黨人都是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盟會時期革命元老，他們是以黃興為首的，至於孫中山在這一時期，並非核心人物。<sup>⑤</sup>

以上所述，是吉野眼中的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運動的各個階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吉野對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為何不能成為一位實至名歸的領導者，提出兩點理由。

- (1) 思想意識的不當：吉野認為孫是一位憧憬法國革命、美國民主式的政治家，是一位沉醉於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等抽象理論的革命家。孫對推展共和政治的執著，勝於他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他可說是一位「世界主義者」，他為了追求能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從不避諱向外國求援。只要有助於他推展民主政治的大業，犧牲民族利益也在所不惜。光緒二十六年(1900)，孫中山為得到臺灣總督對惠州起義的支持，輕諾割讓廈門之事，就是明顯的實例。
- (2) 性格上的缺失：吉野認為孫是一位重理想，輕實務的人，個性剛愎自負，且難與人共事。<sup>⑥</sup>

從以上的研討可知，吉野早期對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歷史地位，基本上是持否定意見的。當然吉野對孫中山有如此評價，和他研究中國革命的初期心得

<sup>⑤</sup> 吉野作造，中國革命史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12-51, 84-88。

<sup>⑥</sup> 同上，頁21-22。又參閱吉野作造，「支那第一革命ヨリ第三革命マデ（一）」，國際學會雜誌，1916年11月，頁34-35。

有關。而造成他這樣的研究心得，自然有其主客觀因素。換言之，他根據個人的政治理念，來評論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這是造成他中國革命觀成型的主觀因素。而奠基他中國革命觀成型的基礎知識，以及這些資訊的來源，並且這些資訊來源所意味的局限性等相關問題，則是他中國革命觀成型的客觀因素。在此，將藉由這些主客觀因素的分析，對吉野的孫中山觀的形成做更進一步的瞭解。

根據吉野的自述，他是在護國軍起義後不久，接受委託而正式開始研究中國革命運動史。而懇請者是熱心支援中國革命運動的右翼社團玄洋社創社人頭山滿及法政學校校長寺尾享。他們希望吉野趁護國軍崛起之際，能將中國的革命精神、革命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廣向日人介紹。<sup>⑦</sup>吉野生平頗自負於他的中國革命史研究，他自稱他所撰寫的所有內容都是依據第一手史料，一則直接耳聞於當事者，再則閱讀當事者所寫的報告。<sup>⑧</sup>撰稿時除了得到戴季陶、殷汝耕兩位革命黨的日本通支持外，<sup>⑨</sup>也得到與革命運動有深厚淵源的北一輝的諄言<sup>⑩</sup>及宮崎滔天<sup>⑪</sup>等人的協助。此外，他還曾向黃興本人查證過部分史實。<sup>⑫</sup>

根據他的自述並細察他研究中國革命的管道以及相關的人脈關係時，可以看出他的中國革命觀與這些背景因素有相當緊密的互動關係。例如，他對孫中山的評論，很明顯的是受到宮崎滔天與北一輝的影響。評孫中山剛愎自負，難與人相處，這是受宮崎滔天的影響。<sup>⑬</sup>論孫中山是一位世界主義者，是一位對民主政治的執著勝過對民族利益的維護，為追求民主大業，不惜借重外援甚至犧牲民族利益等見解，則是因襲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一再重覆的要點。<sup>⑭</sup>宮崎滔天雖然與孫中山淵源深厚，曾是當年勸說孫中山選擇日本做為革命基地的關鍵人物，<sup>⑮</sup>也是同盟會末期，孫中山在日本的全權代表，<sup>⑯</sup>但在二次革命後，立場傾向黃興，對孫中

⑦ 吉野作造，「『三十三年の夢』」解題，收入吉野作造，講學余談（東京，文化生活研究會，1927年），頁155。

⑧ 吉野作造，「評論家としての自分並佐佐政一先生のこと」，講學余談，頁318。

⑨ 同註⑦。

⑩ 同註⑧，頁32。

⑪ 同註⑦。

⑫ 同註⑦，頁156。

⑬ 「宮崎民藏宛宮崎滔天書翰」（1913年10月17日），收入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東京，平凡社，1977年），頁393-394。

⑭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東京，聖紀書房，1921年），頁10-20。

⑮ 詳情請參閱拙文，「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民國79年6月），頁236-237。

⑯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民國54年），頁玖31。

山堅持組織中華革命黨之事，持否定意見。<sup>⑰</sup>北一輝是宋教仁摯友，同盟會時代就是反孫要角，一向主張華興會才是革命的主流。<sup>⑱</sup>至於民國三年吉野在政法學校所培養的與基層黨員的交往經驗，<sup>⑲</sup>雖然吉野自認這些交往經驗是促使他正式踏入研究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但因為這學校為黃興所創辦，與孫中山素無淵源，再加以當時舊國民黨派與中華革命黨因謀國方略的不同而相互對峙的時代背景，這段經歷雖有助於他瞭解黃興，却不能幫助他對孫中山有一公正的認識。換言之，在革命陣營呈對峙局面之際，吉野的人際關係和資訊管道都較偏向黃興的一方，自然會影響吉野對孫中山的觀感。故吉野雖曾與孫中山有一面之緣，<sup>⑳</sup>但在其自述中却刻意不提，反而祇強調他與黃興的交往，這取捨之間，也反映出他個人對兩者之間的好惡。

以上所論是吉野研究中國革命的資訊管道以及人脈關係，所涉及的只是些客觀性問題。但當面臨資訊取得後，如何研判，孰重孰輕，誰是誰非等抉擇性問題時，就屬主觀性的層次，關係到吉野本身的理念取向了。

在吉野第一次公開表達他支持革命黨立場的時論中，他提到他個人對革命黨態度轉變的關鍵因素，在於激賞革命黨人的愛國熱誠，<sup>㉑</sup>而他批評孫中山的最厲之處，莫過於孫中山是一位對民主政治的執著勝過對民族利益的維護，為追求民主大業，不惜借重外援而犧牲民族利益的世界主義者。從以上的評論就可得知，吉野是以民族主義為依歸來評析中國的革命運動。換言之，吉野認為革命的最高目的就是在維護民族利益。痛感祖國的落伍，不惜犧牲，挺身革命的行為是愛國行為，因此值得讚賞。以推展民主政治為最高原則，不惜犧牲民族利益的做法是錯誤的，因此需要批判。吉野是以這種民族主義原則來評判中國的革命，也正因他個人對民族主義的執著，使他能共鳴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同時由於他這種信奉民族主義的信念，使他一方面激賞革命黨人的愛國行為之際，也能大言不慚的支持日本的侵華政策。例如他以確保發展日本人口及產業發展空間為由，支持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約。<sup>㉒</sup>

在吉野強調為維護日本民族利益，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向中國擴充政策的同時，他並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是有排他性的，如過份美化民族主義，只會造成民族

⑰ 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第4卷，（東京，平凡社，1973年），頁312。

⑱ 同註⑭，頁35-37, 46-50。

⑲ 同註④，頁241-242。

⑳ 同註④，頁242。

㉑ 吉野作造，「支那政局私見」，外交時報，1916年6月1日，頁24-32。

㉒ 吉野作造，日支交涉論（東京，警醒書店，1915年），頁228-233。

間的強烈對抗。也就是說，此時吉野還未曾體會到，在對民族主義的詮釋上，他有自我矛盾之處。也由於在民族主義的認同上，吉野思想還未曾定型。因此他對新思潮的接納也比較有彈性，這些也是他後來能超越民族主義的重要因素。而吉野本身意識到他對民族主義認知上的矛盾，是在他開始提倡民主運動之後的事。

### 三、對孫中山評價的轉變

民國九年（1920）起，吉野開始稱讚孫中山在中國民主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思想啓蒙者的角色。他推崇孫中山在護法運動時期，對中國國民灌輸法律至上的觀念，<sup>⑳</sup>在倡導「古時革命是英雄革命，今日革命是國民革命」的觀念上對中國民衆政治觀念的啓蒙作用。<sup>㉑</sup>換言之，吉野開始從思想啓蒙家的角度來評價孫中山。對吉野而言，這是一大改變。爲何吉野對孫中山的評價會從全面否定轉變成部分肯定呢？而個中原由，則必須從吉野的心路歷程以及五四運動對吉野造成的衝擊加以探討。

民國八年（1919）五月爆發的五四運動，雖因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交涉失敗而起，但日本朝野都普遍認爲這是單純的一種反日運動。而吉野却指陳，五四運動除具有外交上的意義外，也有內政上的含意。吉野認爲五四運動有兩個目標，一是對抗外在的侵略主義；一却是排斥中國的專制政治。<sup>㉒</sup>因此吉野強調五四運動也代表著青年學子追求民主政治化的熱誠。吉野認爲北京的學生有此表現，象徵著中國青年已經覺醒，受這種覺醒的影響必會反映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次，中國必會因五四運動而有所改革。<sup>㉓</sup>

在此，吉野呼籲中日親善之道莫過於加強民間的交流。對五四運動中所凸顯出的反日情緒，吉野則歸咎於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不當。吉野認爲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完全是以「利」字爲重，這種過於熱衷追求日本在華利益的政策，導致日本政府自絕於中國國民，只能和那些能容忍日本政府要求，罔顧國家利益的官僚政客打交道。而這些所謂「親日派」的官僚政客，也正因有日本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殘喘。這種惡性的循環，不僅阻礙中日之間的親善，也掀起了中國民間的反日熱潮。至於解救之道，則必須求諸日本民衆的覺醒，發揮其牽制日本政府的力量。<sup>㉔</sup>

<sup>⑳</sup> 吉野作造，「支那最近の動亂を論じて政局の將來奈何に及ぶ」，中央公論，1920年8月，頁108。

<sup>㉑</sup> 吉野作造，「支那の近狀」，中央公論，1921年1月，頁185-187。

<sup>㉒</sup> 吉野作造，「支那に於ける排日事件」，中央公論，1919年7月，頁86。

<sup>㉓</sup> 吉野作造，「北京大學學生騷擾事件に就て」，新人，1919年6月，頁4-5。

<sup>㉔</sup> 吉野作造，「北京大學學生團の行動を漫罵する勿れ」，中央公論，1919年6月，卷首語。又參閱吉野作造，「支那排日の眞因」，廓清，1919年8月，頁23-25。

爲消除日本民衆對五四運動的疑慮，吉野一再爲文解釋，指稱中國民衆的反日，肇因於日本政府支持北京軍閥官僚政府的不當。因此所有的責任是在實行侵略政策的日本政府，而非愛好和平的日本國民。鑑於此，日本民衆不需憂慮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一旦中國民衆瞭解真象，理解到日本民衆和中國一樣，厭惡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同樣正在爲本國的民主化與專制政府奮戰時，中國民衆必定樂意放棄全面性的抗日行動，與日本民衆攜手合作，一起爲牽制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而戰，一起爲促進兩國的民主化而戰。<sup>⑳</sup>

從以上的言論，得知吉野對中日關係的看法有了巨大的改變。首先，他開始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也就是說，他認爲中日關係應是平等的。由於他開始有平等觀念，所以才能自覺日本政府的傳統對華政策是具有侵略色彩的，是錯誤的，否定他以往所堅持，「日本爲維持人口成長及領土發展的空間有權利在中國設置勢力範圍圈」<sup>㉑</sup>的說法。其次，他開始認定兩國之間的民主運動有互動關係。護國軍之役，是吉野對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改觀的契機，雖能促成他共鳴於革命黨人的理想，但仍未脫離隔岸觀火的基本心態。五四運動却使他領會到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的緊密相連，相信兩國間的政治發展是互動的。五四運動期間，吉野一再指陳，中國人民的訴求，是和日本人民一樣，無非是爲了排斥專制政治，企求政治的民主化及外交上的公開化。<sup>㉒</sup>而兩國政府能夠合作，完全起因於他們具有同樣本質，都是爲一己之利，可犧牲國民利益的專制官僚政府。既然兩國國民面對的是同樣性質的敵人，兩國國民就不應該是互相敵對。因此吉野特別呼籲，兩國國民應加緊交流，相互聲援對方的民主化運動。而吉野的呼籲，無一不是顯示他對中國政治民主化運動的認同，也無一不是表露他樂意爲兩國民主化運動催生的意願。

吉野在中日關係看法上有如此重大轉變，當然有其背景因素。在追溯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民衆追求民主運動所帶給吉野衝擊之時，不能忽視的是吉野內心政治理念的變化。換言之，吉野從一位極力支持二十一條條約的狂熱民族主義信徒，轉變成一位能虛心接納中國民衆的抗議、承認以往日本政府侵華政策的不當，並進而成爲致力於中日兩國民主運動的鬪士。這種種歷程，並非中國情勢改觀等的外在因素所能解釋，吉野本身政治理念的改變，也是重要的考量。吉野如何從一位狂熱的民族

<sup>⑳</sup> 吉野作造，「北京學生團の行動を漫罵する勿れ」，卷首語。又參閱吉野作造，「日支國民的親善確立の曙光」，解放，1919年8月，頁102-103。

<sup>㉑</sup> 同註<sup>⑳</sup>。

<sup>㉒</sup> 同註<sup>⑳</sup>，頁3-5。



主義者轉變成一位民主主義者呢？此需從吉野本人的思想轉變和當時日本政治思潮間的互動關係上加以探討。

吉野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在他就讀東京帝大之時，正是「國家有機體」論在日本學術界盛行的時候。國家有機體論意味著國家如同生物一般，任何有生命的生物，其能運作都有賴於各細胞都能謹守本份，發揮應盡功能。此一學說的延伸，就是意指著上至天皇，下至普通百姓，每人都有應盡的本份，天皇的職權並非毫無限制。<sup>⑳</sup>同時，吉野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基督教教義中反覆強調的「平等」、「博愛」等觀點，也深深影響著吉野的成長。<sup>㉑</sup>這些因素促成吉野縱使在厲行軍國主義政策、放任皇權無限擴張的明治時代的大環境下，也孕育著期待民主政治的種子。宣統二年(1910)至民國二年(1913)，他遊學歐洲，使他對資本主義下所顯示的社會弊端，以及勞工運動所表露出的理性抗爭留下深刻印象。<sup>㉒</sup>這些經歷也都加強他嚮往民主政治的意願。

當然，以上所敘，都是吉野本人成長過程中的一些特殊經歷，這些經歷雖然有助於他對民主政治的理解，但並不至於扭轉整個大時代環境灌輸給他的思想模式。亦即僅靠吉野知識性的對民主主義的認識並不能幫助他突破當時的日本社會思潮，直到日本的政治體及社會動亂有了客觀呼應，吉野才將民主主義從知識性的認知提升到實際性的行動。因此在鼓吹民族至上，歌頌日本政府的大陸擴展政策的時代背景下，吉野也不能脫俗的以民族主義的角度歌頌日俄戰爭、<sup>㉓</sup>支持二十一條條約。不過民國三年(1914)四月，大隈內閣的誕生，却鼓舞著吉野開始勇於宣揚他的民主理念。<sup>㉔</sup>

⑳ 涉谷浩，「吉野作造」，收入鶴飼信成等編，キリストの證人たち（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6年），頁67-70。

㉑ 同註⑳，頁164-174。

㉒ 井出武三郎，吉野作造とその時代（東京，日本評論社，1988年），頁30-31。

㉓ 吉野作造，「露國の滿州占領の真相他」，收入松尾尊允編，中國・朝鮮論（東京，平凡社，1982年），頁10-11。

㉔ 而個中理由，需從日本政治的演變談起。日本自明治維新（1853-1877）以來，絕大部份的時期，政權都是由長川薩摩兩地區出身的官僚派系所掌握。光緒十六年（1890）開始實施的議會政治，並不能改變這基本傳統。鑑於總理大臣的誕生是決定於長州薩摩兩大派閥組成的元老會議的推薦，而非議會的票決，因此既成政黨並無意利用議會做為與政府所代表的行政官僚體系對抗，反而相互投效政府，以便確保既得利益。其中以第一大黨政友會的所作所為最具代表性。但民國三年（1914），由於行政官僚體系與政友會內部的矛盾，組閣的重任却意外的轉由非長州薩摩兩派的官僚，也與政友會無淵源的大隈重信出任。大隈重信的出任，打破政友會與長、薩兩派官僚長期壟斷日本政壇的局面，象徵著一股新興勢力的崛起。尤其是民國四年（1915）三月的第十二回衆議院選舉，大隈重信所代表的同志會大勝，一躍而為第一大黨。使當時日本的有識之士都慶幸這新的轉變，寄望這種新的氣象能帶動兩黨政治的良性發展，使日本的政治民主化步入正軌。吉野也是對此一轉變寄以厚望，他的第一篇鼓吹民主政治的評論就是在這種期許的心願下完稿。

民國五年（1916）一月，他發表「試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就是志在推廣「民本主義」。依他的解釋，民本主義一辭是譯自希臘語的「德謨克拉西」。對為何捨當時一般通稱的「民主主義」、「平民主義」等辭不用，而特譯民本主義，吉野的說明是，「德謨克拉西」一辭在政治法律學上包含兩種涵意：一是「國家的主權在法理上是屬於人民所有」；另一是「在政治意義的層面上，國家主權運作的目標是爲了人民」。前者，吉野認爲這是一種法學理論上的抽象理念，在君主立憲國推展有實際的困難。而後者主旨是強調「民享」的觀念，衡量的標準不在於探討主權的歸屬，而在於政治權力運作的最終目標是否爲了人民福祉，政策決定的過程是否以民意爲依歸。因此，後者的理念，不會被國家的原有體制所限制，在任何國家都有推展的可能性。鑑於「德謨克拉西」有兩層含意，如採用「民主主義」一辭，容易導致觀念混淆，吉野因此特譯爲「民本主義」，強調他理解的「德謨克拉西」，只是意指國家主權運作的最終目的就是爲了增進人民福祉。<sup>36</sup>

吉野此一論文，引起日本全國有識之士的巨大回響，並爲日本「大正民主運動」揭開序幕，吉野也因此被時人譽爲「大正時期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吉野在晚年的自敘中，自認此一論文，並沒有在民主理論的推廣上有特別建樹，但因配合時勢，以及提供在日本的特殊環境下推展民主政治的空間，因此能廣爲時人所接受，<sup>37</sup>可謂持平之論。

吉野的「民本主義」，因不涉及主權的歸屬，因此在天皇的體制下也有實施的可能性。換言之，吉野對「德謨克拉西」的重新詮釋，不僅提供日人在天皇制下推展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也因爲其尊重現行體制，迴避與天皇制直接衝突，促成其免於被日本政府當局立即抹殺的命運。<sup>38</sup>何況，當時的國內外環境也有助於他宣揚民主理念。國際環境方面，自從美國加入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的就從傳統的國家利益戰爭一躍而成爲「爲民主主義而戰」。美國式的民主理念，生活方式也隨著美國參戰而廣爲世人知曉。國內環境方面，因日本本身爲協約國之一員，對協約國「爲民主主義而戰」的口號，不得不表示尊重，此一尊重政策反映在日本國內，就是一改往常強制鎮壓的政策，對民主主義在日本所造成的浪潮改採默認態度。<sup>39</sup>而

<sup>36</sup> 吉野作造，民本主義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29-31。

<sup>37</sup> 同註<sup>36</sup>，頁27。

<sup>38</sup> 吉田千代，評傳鈴木文治：民主的勞使關係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年），頁138。

<sup>39</sup> 同註<sup>37</sup>，頁25-28。

吉野也就在這股浪潮的助陣下，一躍而成爲當時日本輿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評論家。民國七年（1918）一月，他秉承前文，發表「再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在此論文中，他對「民本主義」的定義做了部份修正。前一論文中他強調民本主義兩大要件，一是政治權力運作的最終目標是爲人民福祉，另一是政策決定的過程應以民意爲依歸。在這篇新作中，吉野保留第一項，把第二項修改爲政策決定的過程應容納民衆普遍性的參與。<sup>40</sup>明白揭示民衆應有參政權。這篇論文是吉野從思想的啓蒙工作者晉身於實際參與政治改革運動的里程碑。自此，吉野正式參與「普選」運動，<sup>41</sup>要求日本政府早日廢除選舉資格的限制，應賦予每一日本成年男人選舉權利。

雖然，日本政府對吉野的民本主義運動採默認態度，但日本右翼團體却不願坐視。民國七年（1918）十一月，浪人會約吉野公開辯論「民本主義」。浪人會的目的，無非是想公開凌辱吉野。但不料此舉却激起東京地區的學生以及友愛會旗下勞工們的義憤。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公開辯論，會場裏擠滿著吉野的支持者，因此浪人會企圖的羣衆公審大會並未得逞。<sup>42</sup>但此次公開辯論會却促成了「黎明會」及「新人會」的誕生。<sup>43</sup>

黎明會是一羣贊成民本主義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學術團體。成員四十人，以舉辦研討會及出版研討會專集爲活動主要內容。成立的目的，是爲了保衛吉野及宣揚自由民主理念。<sup>44</sup>此會成立一年八個月後，就因內部思想不統一而解散。但成立期間正逢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及韓國的三一運動，因此，成立期間對國際主義思潮的演進，日本對華政策的再深思，殖民地政策的反省，社會政策理念的推廣，選舉權的普及化等課題都有深入的探討，替大正民主運動（1913-1925）提供了理論架構。<sup>45</sup>當然，吉野也因此會的成立，更提升了他在大正時期做爲一個思想啓蒙家的影響力。

<sup>40</sup> 同註<sup>38</sup>，頁 264-267。

<sup>41</sup> 日本自光緒 16 年（1890）開始實施議會政治，初期的選舉制度，對選舉資格有嚴格限制。唯有年滿二十五歲，每年直接納交國稅達十五元者，才可取得選舉資格。由於有財產資格的限制，因此在吉野提出「普選」之時（1918年），全國人口五千三百萬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口一百五十四萬人有選舉權。「普選」的漢字全文是「普通選舉」，意謂著大家都有權參與選舉。

<sup>42</sup> 同註<sup>39</sup>，頁 37-40。

<sup>43</sup> 中村勝範，「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一断面：黎明會の研究」，慶應義塾創立一百二十五年紀念論文集：法學部政治學關係，1983年10月，頁3。

<sup>44</sup> 同上，頁 3-10。

<sup>45</sup> 詳情請參閱註<sup>43</sup>；又參閱中村勝範，「黎明會創立における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一齣」，法學研究，1985年2月；中村勝範，「黎明會とその漸進主義」，法學研究，1986年12月；中村勝範，「社會變動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法學研究，1987年2月；中村勝範，「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黎明會：黎明會第四回講演會を中心に」，法學研究，1988年1月；中村勝範，「黎明會大阪講演會における主張の變化」，法學研究，1988年5月；中村勝範，「三・一事件と黎明會」，法學研究，1988年12月。

新人會是以吉野門下的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為中心而組成的學生社團。以參與社會改造運動為宗旨。此社團開啓知識份子參與羣衆運動的先端。新人會成立於民國七年（1918）十二月，爾後日本各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勞工運動都直接或間接的與此會有關。昭和初期（1925-1926）所興起的新興政黨，絕大部份的領袖都是出身於新人會。<sup>④⑥</sup>因吉野與新人會初期成員的師生關係以及對新人會成立初期的援助而被時人譽為新人會之父。<sup>④⑦</sup>吉野也因新人會的成立而建立起與社會改造運動間的溝通管道，這些，當然有助於他對政治世界的瞭解，進而也提升他在輿論界的影響力。

吉野從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轉變成一位民主主義者，和當時的國際思潮、日本國內政治局面的變化，都有密切互動關係，也由於他對民主主義的認同，他開始強調國家民族利益的同時，也不忘記社會正義、國民福祉的重要性。這些思想的轉變明顯反映在他對孫中山的評價上。以往他否定孫中山，因為他不齒孫中山對推展民主政治的執著，勝於他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但吉野在逐趨認同民主主義之時，對孫中山的執著，也漸能理解。尤其是他在國內宣揚民享理念時，最主要的阻力是來自右翼團體。如浪人會就是一羣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組合體，<sup>④⑧</sup>對民族主義者的偏狹和排他性，吉野深受其苦。這些歷程，也是孫中山的歷程。這些相同的境遇，增進他對孫中山的認同。這些認同也逐一的反映在他的時事評論。民國九年（1920）起，他開始稱讚孫中山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思想啓蒙者的角色，就是一明顯例證。吉野這些轉變，句句也是反映他個人的心路歷程，在他深知思想的啓蒙對政治民主化重要性的同時，也能對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性有進一步的認識。不過以上吉野對孫中山的認知，還僅限於思想啓蒙家的角色，他對孫中山的全面性肯定却有待北伐時期，孫中山的思想成為國民政府建國理念，而他的民主運動在日本一再受挫之後。

#### 四、全面肯定孫中山

民國十五年（1926）十二月，吉野開始撰文介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吉野除對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涵作解析外，也對三民主義成立的時代背景一一加

<sup>④⑥</sup> 同註②，頁 24, 32。

<sup>④⑦</sup>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東京，塙書房，1978 年），頁 53。

<sup>④⑧</sup> 同註④⑨，頁 6。又參閱玉井清，「新人會と吉野作造」，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第 20 號（1985 年 1 月），頁 165-169。

以探討。文中他稱讚孫中山高瞻遠矚，在衆人都只關心種族革命之際，孫中山已認清政治改革及推展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換言之，衆人將革命的目標，標誌在推翻清廷，恢復漢族河山之時，孫中山已將革命目標定位於以民主共和政治的方式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孫中山也因其立義超越時人所能理解的範圍飽受爭議，但孫從不退縮。事實上，中國政局的演變，在在顯示僅靠種族主義革命，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動亂，無一不凸顯出民權、民生主義革命的重要性，這也是三民主義仍然被國民黨奉爲立黨原則的原因。因此之故，吉野稱讚孫中山爲一代偉人。

在吉野推崇孫中山之同時，吉野也在同一文章中，對自己的理念與奮鬥的目標做了一概括性的介紹。他自認自己是一位右傾的社會主義者。他與日本左派社會主義的不同，是基於奮鬥的層次不一。左派的社會主義者認爲今日日本所有社會的弊端是起源於資本主義的社會本質。萬務之急，莫過於改造社會組織。既然改造社會組織如此逼切，爲早日完成改造，當然就不需顧忌手段。在此，吉野強調，對批評資本主義在今日日本所造成的種種弊端，他的見解與左派社會主義是完全一致的。兩者的差異，只是左派過份專注於破壞現有的社會體制，而忽略了破壞後應如何建設等問題。他認爲今日日本左右派社會主義之爭，就雷同當年孫中山與同盟會時期那些熱血愛國青年間的爭鬥一般。在衆人痛恨異族統治，耳目所及盡是種族革命之際，孫中山已將中國革命的目的定位在追求中國政治的民主及社會福祉的提升上，認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種族革命只是爲達到上述目標的一項手段。雖然事後證實，僅憑民族革命不能解決中國革命後的問題，但孫中山的理念，在同盟會時期却飽受爭議，爭議的情況如同今日他與左派之間的爭鬥。在此，吉野以中國革命所經歷的歷程爲例，重申他今日的堅持，有其必要，他以孫中山奮鬥的歷程爲楷模，強調他今日的堅持，必會有所收穫。<sup>49</sup>

從以上所述，得知吉野對孫中山的評價，除已提升到全面信服的階段外，並將孫中山視爲他個人自我期許的目標。導致吉野對孫中山的評價有如此前後不一的變化，當然也有他主客觀的因素。孫中山思想已成爲國民政府的建國理念，孫中山的成功是萬目共矚，孫中山的評價已非個人好惡所能左右，這是客觀因素。至於他個人心境的演變，進而影響他對孫中山的評價，這是主觀因素。早期他否定孫中山，批評孫中山重理想輕實務，往往又爲求早日在中國推展其民主大業，不惜盲目爭取

<sup>49</sup> 吉野作造，「三民主義の解」，婦人公論，1926年12月，頁60-63。

外援，犧牲民族利益。其後，他逐漸對孫中山表示認同，稱讚孫中山在宣揚民主主義，啓發中國民智的活動上，有卓越貢獻。此刻，他則全面肯定孫中山，因為他瞭解到中國革命後的動亂，無一不在凸顯爭取民權、推動民生主義的重要性。中國局勢的演變，在在證實孫中山當年的堅持是高瞻遠矚的。再加以，他對革命運動時期爭取外援一事的認知有所轉變。早期他認為這種行爲將背負犧牲民族利益的代價，所以持否定態度；此刻，他却認為爭取外援只是爲求生存之權宜之策，應予以諒解。<sup>⑤</sup>換言之，吉野對孫中山評價的前後不一，主要要素不在於孫中山的建國理念或者領導風格有所改變，而是在於吉野個人觀念的銳變。尤其是他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是促成他對孫中山予以全面性肯定的關鍵所在。唯有他開始理解到國家、民族的利益是建立在每個人基本生存權受到尊重之時，民主政治的最終價值莫過於維護個人的基本生存權之時，他才能體會孫中山的用心，進而才能肯定三民主義的意義。

以上所論是吉野對社會主義的認同與對孫中山認同間的互動關係。然而，吉野又是如何開始認同社會主義呢？箇中原由，則需從吉野參與勞工運動、普選促進運動以及提倡「無產政黨」的歷程加以探討。

吉野踏足勞工運動始於民國三年(1914)六月，以評議員身份加入「友愛會」。<sup>⑥</sup>友愛會是日本工會組織的開山鼻祖，成立於民國元年(1912)八月，成立初期，因畏懼觸犯日本政府禁止任意結社的法規，而以勞工同仁互助會的名義展開活動。<sup>⑦</sup>在初期，吉野對友愛會所扮演的勞資協調功能，並無異議。但民國七年(1918)所爆發的「搶米暴動」，却使吉野對友愛會有更進一步的期待。

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富川縣滑川鄉一羣漁民主婦，因不耐米價逐日高漲，臨時起義，羣擁至米店，哀求米商，廉價供米。此一運動立即獲鄰鄉響應。運動初期僅限於請願活動，但因得不到具體回應，八月份時，竟演變成漫延全國三十餘縣，暴力搶米，火燒商家的羣衆暴動。在神戶、名古屋、山口縣等大都市，甚至

<sup>⑤</sup> 孫中山辭世之時，吉野沒有特別表示，不過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之際，吉野特地撰文表示支持。首先，他對孫中山生前制定的聯俄政策做了以下說明。他認為，在面對強敵之際，接受外援是求生存之道，並非意味媚外，更非其甘願淪爲傀儡。即使在接受外援之際，也會承諾給予對方某些特殊權益，但絕不致到喪權辱國的地步。在此，吉野特舉中國革命初期接受日本援助爲例，來說明國民政府與蘇俄的關係，並依此，斷言國民政府不會赤化。也以此爲由，強調日本不應因恐懼國民政府赤化，而出兵干涉北伐。此文的主旨，是希望能消除日本朝野對國民政府聯俄政策的疑慮，但吉野以孫中山早年的聯日政策爲例說明接受外援並非喪權辱國，明顯表示出他個人以往對孫的成見，至此已煙消雲散。一向最爲他所詬病的孫中山盲目爭取外援一事，此時此刻已被他肯定爲求生存之權宜之道。吉野作造，「支那と露西亞と日本」，中央公論，1926年9月，頁183-186。

<sup>⑥</sup> 同註<sup>⑤</sup>，頁99。

失控到需要出動軍隊開槍鎮壓。<sup>53</sup>雖然事後寺內內閣為此引咎辭職，但對此一悲劇的發生，吉野始終無法釋懷。

吉野認為羣衆會暴民化，起因於民不聊生。一切的責任必須歸咎於政府常年刻意犧牲基層民衆福利。爲求補救，唯有從制度上著手。換言之，吉野認為唯有重新調整政治結構，否則無法避免悲劇重現。補救之道，就是改進現有選舉制度。依吉野的解釋，現有選舉制度因對選舉人的財產資格有重重限制，因而造成唯有富人才能選舉。富人間的選舉，不僅使議會制度沒有代表性，也促使代議制度成爲富人利益的表達工具。代議的體制裏，既然沒有基層民衆的代言者，自然所有的政策都是被代表富人的資產階級者一手所主導。所有的政策，當然也就成爲富人的服務工具了。在此，吉野強調，唯有廢除財產資格限制，讓每一位成年男子都有投票權，才能使無產階級代表有機會進入國會，有機會督促政府注意基層民衆的利益。<sup>54</sup>吉野也是基於此一認識，開始在日本積極推展普選運動。<sup>55</sup>但吉野也瞭解改善基層民衆生活也是刻不容緩之事，如求立竿見影唯有走上直接向資本家示壓一途。吉野贊成勞工應擁有保留罷工的權力。<sup>56</sup>換言之，吉野認為解決日本基層民衆生活困境之路，治本之法，在於推展普選運動，讓窮人的代表也能參與立法，在法律上謀求公平。治標之道，在於以羣體的力量向資本家示壓，以罷工的手段，逼使資本家拿出誠意。在吉野認識到「搶米暴動」的原由，是因爲民不聊生，民衆之所以挺而走險，起因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等因果關係後，吉野的興趣則由「民本主義」的提倡，進一步提升爲替社會主義請命了。而與吉野淵源深厚的友愛會，也在吉野思想轉變的影響之下，進行大幅度的改組。<sup>57</sup>

吉野因爲與推動友愛會改革運動的兩位關鍵人物，麻生久與棚橋小虎，有師生關係，兩人又皆是「新人會」成員，而兩人之所以能進入友愛會和吉野都有直接或

<sup>53</sup> 同註<sup>52</sup>，頁 96-98。

<sup>54</sup> 赤松克麿，日本社會運動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年），頁 152-154。

<sup>55</sup> 吉野作造，社會問題及び社會運動（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 56-69。

<sup>56</sup> 同註<sup>53</sup>，頁 166-167。

<sup>57</sup> 同註<sup>54</sup>，頁 93-98。

<sup>58</sup> 友愛會的改組是在民國八年（1919）八月三十一日，時爲友愛會第七週年慶。主要的改革在於內部組織章程以及組織宗旨的修訂。修改後的友愛會從原來的會長獨議制改爲理事合議制。組織宗旨也從聯誼、互助會的性質一改而爲以提升勞工地位、改善勞工待遇爲目的的工會團體。爲了配合新的宗旨，友愛會也正式更名為「大日本勞働總同盟友愛會」。改組完成後的友愛會，一改往日的溫和形象，專門以支援各地分部罷工爲活動內容，以打倒資本主義社會爲號召。由於它的激進作風，使其一躍而成爲當時反對現行體制的大本營。同註<sup>57</sup>，頁 159-162。又參閱中村勝範，「勞働運動における量と質」，法學研究，1989年12月，頁 45-46。

間接的關係。<sup>58</sup>吉野對友愛會的發展動向，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這也是他在推展勞工思想啓蒙運動中的顛峰時期。

友愛會的行動日趨激烈是在民國八年六月，麻生久進入友愛會擔任出版部部長，掌握主導權之後。<sup>59</sup>從溫和路線一改爲激進路線的友愛會，氣勢如虹。採用直接與社會抗爭的策略，也使友愛會的負責人體驗到權力的滋味。但在友愛會逐漸提升衝突層次，手段逐漸暴力化時，吉野與友愛會之間的歧見却日漸加深。大正八年（1919）十月所爆發的第一屆國際勞工會議勞工代表派遣問題，是吉野與友愛會關係日趨疏遠的關鍵因素。<sup>60</sup>對友愛會改組前後，所主導的一些暴力抗爭手段，吉野也深感不滿，爲此，他特地撰文宣揚人道主義。在這篇題爲「勞働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指導一文中，吉野期待勞資雙方均能以人道主義的立場考慮勞資糾紛。在此，吉野強調鑑於以往資本家的蠻橫，勞工階級爲求生存，用階級鬭爭的手段以求自衛之事，他無可厚非，但工會應注意，階級鬭爭永遠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吉野認爲鬭爭只是逼使資本家就範的工具，而非打倒資本家的道具。此刻，他自承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認爲在今日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勞工是處於弱勢地位，連基本生存的保障都談不上，但勞工也是維持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支柱，對社會而言不應忽視維繫勞工，應保障勞工的基本生存權。基於此一體認，他贊成運用罷工等手段爲爭取公平待遇而抗爭。可是，抗爭是爲了求公平待遇，而非爲了毀滅資本階級。換言之，吉野贊成勞工團體抗爭，是因爲當今之勢勞工處於劣勢，但一旦勞工經由抗爭取得合理地位後，勞工就應放棄抗爭，勞資雙方都應秉持理性，在尊重雙方的立場下謀求合作。吉野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就是意味著勞資雙方本質上是平等的，雙方都應尊重彼此對方存在的權利。<sup>61</sup>總結的說，吉野認爲勞資雙方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sup>62</sup>反對以階級鬭爭的觀點來解決勞資問題。這一觀點與孫中山的基本見解是一致的。孫中山也反對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原動力的說法，認爲人類互助才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從兩者都排斥階級鬭爭的觀點來看，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詮釋，是有

<sup>58</sup>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頁 51-55。又參閱中村勝範・酒井正文，「新人會成立の背景」，法學研究，1978年 5 月，頁 107。

<sup>59</sup> 同註<sup>58</sup>，頁 176-181。又參閱註<sup>59</sup>，頁 159-162。

<sup>60</sup> 當時吉野支持由勞工代表選定全國協議會所推舉的第一候選人選，友愛會評議員，同爲東京帝大教授的高野岩三郎出任第一屆國際勞工會議勞工代表。但是友愛會却堅持否認全國協議會的公正性，不惜運用街頭暴力手段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改派友愛會會長鈴木文治爲代表。中村勝範，「文明に逆行した勞働運動及び思想と學問の貧困」，法學政治學論究，第 1 號，1989 年，頁 15-19。

<sup>61</sup> 同註<sup>60</sup>，頁 93-111。

<sup>62</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三民主義：增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67 年），頁 227-234。



其共通性的。

吉野發表此文，是針對行動日趨激烈的友愛會而來，友愛會能夠順利改組，和吉野支持勞工應享有罷工權有關。但麻生久入主友愛會的行徑，却超越吉野所能容忍的範圍，進而為文批評，<sup>⑬</sup>無非是想藉輿論來牽制麻生，但這也象徵著吉野已無拘束麻生的力量。吉野與友愛會疏遠，也意味著吉野已無主導友愛會的力量。對渴望藉由合理的勞工運動來達到社會改造目的的吉野而言，喪失主導友愛會的機會，無異是他推展社會民主運動的一大挫敗。

民國十四年（1925）三月三十日，日本衆議院通過普通選舉法。新的選舉法取消了財產限制，使每一位年滿二十五歲的男子都有投票權。新的制度實施後，選民人數從原有的三百三十四萬人一下擴增為一千四百一十五萬人，擴增率有四倍之多。<sup>⑭</sup>選民人數有如此大幅度增加，當然也提供政黨政治有更大的擴充空間。這批新增的選民，都是因廢除財產資格制度而取得選舉資格，普選的特色在於這些選民都不是富裕之家，因而被俗稱為「無產階級」。針對這批新增選民，而擬組的政黨，則被時人稱為「無產政黨」。

對當時盛行的組黨之議，吉野持否定意見。吉野認為今日日本民主政治之不振，現有政黨的極端腐化，不盡職守是重要原因。而現有政黨之所以腐化是因選舉地盤固定化。由於每一政黨都有固定支持票源，因此對新票源不積極爭取，對舊票源也不慮其流失。長期演變，造成日本的政黨都因循行事，也形成政府無能選民無權的政治文化。為避免重蹈覆轍，吉野反對無產階級組黨，認為無產政黨的成立，無非是使無產階級的票源僵硬化，無助於日本政治的民主化。<sup>⑮</sup>吉野強調政治是專業範疇，應委託少數專業人士負責，無產階級最重要的責任還是在扮演一個盡職的監督者角色。

吉野這一套「政治家的專門才能與國民無極限監督權結合」<sup>⑯</sup>是民主政治精義的說法，與孫中山所提倡的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權能區分」，<sup>⑰</sup>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看來雙方對民主政治的理念頗有相互通容之處。當然，這方面的共同性，也會有助於吉野對孫中山的肯定。

<sup>⑬</sup> 中村勝範，「吉野作造の人道主義的勞働運動觀」，收入稻田俊信編，政治學をめぐる諸問題：鶴澤義行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日本大學法學部，1990年），頁49-53。

<sup>⑭</sup> 中村勝範，「第一回普通選舉と無產政黨」，法學研究，1962年8月，頁33。

<sup>⑮</sup> 吉野作造，「無產政黨問題に對する私の態度」，收入吉野作造，日本無產政黨論（東京，みすず書房，1988年），頁3-12。

<sup>⑯</sup> 同上，頁5-6。

<sup>⑰</sup> 同註<sup>⑮</sup>，頁171-187。

雖然吉野在普選法通過初期，對組織政黨持否定意見。但在民國十五年(1926)十一月，吉野却一改往常態度而與早稻田大學教授安部磯雄、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堀江歸一，三人聯名發佈組織政黨促進會，並聯名邀請非共的各界社會主義人士加入。此一以右派工會、知識份子為對象的促進會，由於得到各方熱烈回應，因此於同年十二月，成立了「社會民衆黨」。<sup>68</sup>吉野雖然信守其不加入政黨的承諾，沒有加入社會民衆黨，但此一政黨的成立以及立黨的精神，無一不受吉野影響，因此他被時人譽為「社會民衆黨的催生者」。<sup>69</sup>但吉野為何一改初衷，而參與組黨呢？其中情節，則需從當時的社會思潮以及勞工運動左右兩派對峙的時代背景加以探索。

日本共產黨是在民國十一年(1922)十一月，在第三國際的承認下成立。成立初期的成員以早稻田大學出身的學運領袖為中心，以組織農民、滲入工會為組織工作要點。<sup>70</sup>但他們的活動旋即被日本政府探知，於民國十二年(1923)四月，遭受查獲。日本共產黨的再起，是在民國十五年(1926)，但這次再起的核心人物，却是東京帝大出身，與吉野有深厚淵源的「新人會」成員。<sup>71</sup>再起的共產黨，寄身於合法運動的工會組織。但這只是他們再起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却是分化當時的總工會勞働總同盟(原名友愛會)。民國十五年五月，受日本共產黨操縱的左派，率同原勞働總同盟旗下二十三個支部工會，會員八千人另成立了勞働組合評議會。<sup>72</sup>

這是勞働總同盟的第一次分裂，也是日本共產黨向無產階級運動奪權的第一步。爾後，日本共產黨滲入無產政黨，進一步參與無產階級運動主導權的爭奪。

日本的第一個合法無產政黨是「勞働農民黨」，成立於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成立的目的，就是針對下一屆的衆議院選舉。由於成立的前一年，有一千零八十一萬的無產階級選民剛取得選舉權，因此多年為無產階級奮鬥的工會、農會以及教育文化界的知識份子都希望此刻能集羣雄之力，組一無產政黨。一方面好爭取選票，另一方面也為將來執政大計鋪路。雖然，吉野對這一組黨計畫持反對意見，不過，新政黨還是如期成立。雖然新政黨籌備初期，各方派系都曾相約要排除日本共產黨。但是成立以後，却發覺日共實際已滲入黨內核心。黨內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因處理日共問題無法取得共識，而一直無法議事。為此，主張反共

<sup>68</sup> 同註<sup>68</sup>，頁 221-222。

<sup>69</sup> 同註<sup>68</sup>，頁 232。

<sup>70</sup> H. スミス著，松尾尊允、森史子譯，新人會の研究：日本學生運動の源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年)，頁 84-92。

<sup>71</sup> 同上，頁 95。

<sup>72</sup> 同註<sup>68</sup>，頁 220-222。

的勞働總同盟憤而宣佈退黨。<sup>73</sup>由於勞働總同盟退出，勞働農民黨因而完全為日共把持。<sup>74</sup>

鑑於日共把持了勞働農民黨，吉野爲了避免使所有的無產階級運動赤化，因而挺身而出號召所有非共的社會主義者組織新黨。這就是他參與「社會民眾黨」組黨的由來，這也是他與左派抗爭的據點。吉野在宣揚右派的社會主義觀念時，一再強調他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但反對運用暴力手段達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換言之，他認爲一切社會的改革應在運用議會政治的基礎上推展。<sup>75</sup>在他肯定保障基本生存權的重要性時，也不會忘記強調遵行民主法則的重要性。吉野也是基於此一認識，反對共產主義。這一方面，吉野與孫中山的基本理念，可謂一致的。孫中山也自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sup>76</sup>他所追求的「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的大同世界，無異也是每一社會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理想。但他在追求立足點的經濟平等時，他也不曾忘懷憲政發展的重要。因此他否定共產主義的理由，和吉野也是雷同的。

從以上研討可知，吉野對孫中山的肯定與他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有互動關係。唯有吉野在參與勞工運動及目睹「搶米暴動」以後，才能體會資本主義的弊端，才知道保障人民生存權的重要；也唯有此刻吉野才能理解中國革命不應局限於民族革命，民生主義在中國革命裏所扮演的時代意義。在吉野自承是一社會主義者的同時，他也能逐漸坦承三民主義的前瞻性。再加以，兩者對階級鬥爭的看法，民主政治運作上有關「權能區分」部份上的理解，排斥共產主義等立場上的一致，更能增進吉野對孫中山的推崇。當然，他個人在日本推展社會民主運動的一再挫敗，也有助於他體認思想啓蒙家的難爲，而這些體認也一一促成他給予孫中山一公正的評價。

## 五、結 論

吉野對孫中山的評價之所以前後不一，從否定轉變成肯定的關鍵，在於他對中國革命認知的角度以及他個人政治理念的演變。早期，他否定孫中山，因爲他將中國革命定位在種族革命，認爲中國的革命是在企求民族的復興。由於他對中國革命的期許只限定於民族的復興，因此他不齒於孫中山爲追求民主大業，不惜借重外

<sup>73</sup> 同註<sup>53</sup>，頁 230-232。又參閱中村菊男，日本政治史讀本（東京，東洋經濟，1978年），頁 129。

<sup>74</sup> 同註<sup>54</sup>，頁 58。

<sup>75</sup> 同註<sup>54</sup>，頁 116-140。

<sup>76</sup> 同註<sup>52</sup>，頁 254。

援，犧牲民族利益的做法。爾後他肯定孫中山則是因為他已能從一位單純的民族主義者的角度，轉變成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換言之，他對孫中山的推崇，始於他體會到三民主義的前瞻性，始於他開始理解國家、民族的利益是建立在每個人基本生存權受到尊重，民主政治的最終價值莫過於維護個人的基本生存權，也始於他認清孫中山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和國民的福祉」，與他在日本奮鬥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